



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走向世界历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历程

刘海涛 著

“中国道路”

“中国经验”

“中国模式”

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走向世界历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历程

刘海涛 著

“中国道路”

“中国经验”

“中国模式”

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历程/
刘海涛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 9
(2012. 11 重印)

ISBN 978-7-5035-4794-2

I. 走… II. 刘… II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5158 号

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历程

责任编辑 曲 炜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高 鹏

责任印制 王洪霞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1

第一章 历史重负

1. 封建社会 / 16
2. 中央集权 / 24
3. 周期性危机 / 29

第二章 东方破晓

1. 士大夫的抗争 / 37
2. 农民的造反 / 40
3. 维新派的改良 / 43
4. 革命的兴起 / 47
5. 三民主义政纲 / 50

第三章 曙光初照

1. “养民新学” / 60
2. 对接传统文化 / 63
3. 思想转变 / 68
4. 组建共产党 / 74

目 录

CONTENTS

第四章 万里长征

1. 探究国情 / 80
2. 创立新民主主义 / 85
3. 畅想未来社会 / 92

第五章 艰辛探索（上）

1. 制度模型 / 99
2. 理论来源 / 103
3. 现实形态 / 111

第六章 艰辛探索（下）

1. “继续革命” / 120
2. 改革的起步 / 126
3. 认识的局限 / 131

第七章 开创伟业（上）

1. 放眼世界 / 137
2. 农民的创举 / 142
3. 转折点 / 147

目 录

CONTENTS

第八章 开创伟业（下）

1. 痛定思痛 / 153
2. 正本清源 / 157
3. 总体设计 / 164

第九章 与时俱进

1. “政治交代” / 173
2. 市场经济 / 178
3. 思考“大问题” / 183
4. 得出“重要结论” / 188

第十章 科学发展

1. 阶段性特征 / 194
2. 创新思维 / 199
3. 求真务实 / 203
4. 建设核心价值体系 / 209

结束语 新的起点 / 214

后 记 / 221

序 言

201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90华诞。

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

“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

道路、理论、制度是凝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基本要

素。旗帜就是形象，旗帜就是方向。正是在这面旗帜指引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沿着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自觉创造历史，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于1978年。它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中华民族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离不开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它是中国的“国别史”与“世界历史”进程，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交汇融合的结果；它既代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线索，又体现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它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第一个模式——“苏联模式”的超越，是一个既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又合乎中国国情、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现实形态；它不仅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探索 and 创新的结晶。它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社会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历程。以中国社会“独特的特征”切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它的起源、历史形态和形成发展的脉络，勾画它的基本线索，是本书的主旨和重点。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①“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出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今天这个发展点上的凝结，绝不意味着它的发展过程已经“完成”，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必然要唤起人们对其成长轨迹的回忆与思索，因为新的事实总是要“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②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的研究”^①。按照这个思路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多年的历史就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指引的人类社会发展方向，通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引导中国走向世界历史、实现人类解放的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永无止境，但是这一“新的事实”由于它的历史影响早已为世人所关注。

在 1500 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英国率先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最早跨入工业化的门槛，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紧随其后，接踵而至。尽管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但“资本主义”是其共同的本质。代替中世纪小生产的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②“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③显而易见，开创世界历史，实现人类社会从农业到工业、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变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也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的体现。这种革命性的作用不仅改变了西欧北美的面貌，在世界历史的视野内，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那些或多或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④“资产阶级，由于一切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4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6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67 页。

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但是，日后的历史表明，至少在今天，并不是“一切民族”都采用了“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许多国家的人民也没有像东施那样效资产阶级之颦。尽管那些“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前身有西方“先生”的榜样，但是，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困难重重，并且还要经常挨“先生”的打骂。国外有学者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起始时间和存在规律，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梯队的理论，认为第一梯队包括西欧和美国，俄国属于第二梯队，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属于第三梯队。原苏联科学院历史学家戈里诺夫认为，第二梯队国家通常在发展阶段上落后于第一梯队，因此发展具有追赶和跳跃的性质，但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阻力最大^②。这一“阻力”的客观存在，迫使俄国改变了历史顺序，中断了1861年通过农奴制改革开始的资本主义进程，以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前提开辟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毛泽东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③对于这个评价今天可能有人要提出质疑，但从此通过“非资本主义”的途径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则成为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由此也许要改动一下：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必须另辟蹊径，以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的老路，但前提是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或许马克思晚年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在头脑中闪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火花。

中国就是深受十月革命和“苏联模式”影响的国家之一。20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

② 参见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1页。

③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纪3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中国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固为重要,而分配制度的改善,——直截了当的说,即社会制度之彻底改革,尤为重要。目前横在我们眼前的有两种模型:一个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现在已临到第三期恐慌了,日博崦嵫,历史早已为它掘好了坟墓,丧钟的撞响,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则正以加速的武步向胜利的前途,第一次五年计划既已成功,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已开始。无论是工业劳动者或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所焦灼的,所孜孜以从事的,不是个人财富的积累,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基础的建设巩固与世界社会主义前途之争取。这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对照,恰是两个世界,两个历史范畴。我想,假如我们不愿长此困于泥泞之中,则在这样的对照下,何去何从?无论是谁,都该知所选择罢!”^①当时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和许多进步人士都坚持这个观点。最终,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至少说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

不仅仅是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亚一大批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或早或晚地走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实现了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历史性飞跃。但是好景不长。在同资本主义进行历史性竞争的过程中,“苏联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最终演变成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旧体制障碍,致使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远远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连同“苏联模式”一起不可避免地崩溃了。苏东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国家制度从社会主义滑向西方的“自由民主”,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联邦共和国分家散伙,是谓“苏东剧变”。在经历转变的阵痛以及分化整合之后,多数国家恢复了元气,境遇有所好转,甚至有的国家日子还算不错,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不可低估。这个事

^① 杨幸之:《论中国现代化》(1933年7月),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255页。

实表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验在苏东国家告一段落。尽管前途未卜，但这些国家也可以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继续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不妨说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并未终结。

中国也曾受过“苏联模式”弊端的困扰，但是并没有因此中断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实现了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为社会主义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生机活力。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终止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由此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历经20多年的实践之后，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正式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已经在中国的土壤上扎下根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学习、引进到“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转变，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更加自觉和自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外有人也许不愿意将其归因为“社会主义”，国人又要避“革命输出”之嫌，因而近年来有了所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说法。实际上，应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道路”就是中

^①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壮丽的日出”。

本书旨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经历。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如此之短，以至于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的条件还不成熟；甚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能否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站稳脚跟，还需要通过以后长期的实践加以检验和证明。如果从1516年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算起，社会主义学说至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了，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史”得以成立。而这期间，空想社会主义支配社会主义的观点就长达300余年。社会主义实践，如果从英国的掘地运动算起，也历经400余年，因此也就有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但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过160余年。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创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20世纪在苏联以及东欧、亚洲等国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过是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中打开的一个缺口，进行的一场局部试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有很大的差别：它不是取代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并行发展的社会；它不是“全球性”的社会主义，而是“区域性”的社会主义；它不是由“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而是以“社会主义国家”面貌出现的社会形态。因此，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①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研究还处在搜集和积累“史料”阶段。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终结”的说法一时间甚嚣尘上。日裔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5页。

山在1988年的一次讲座中首次提出“历史终结论”，以此为题形成的论文于1989年发表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期刊《国家利益》上。他认为，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不仅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更证明了人类历史发展只有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一条道路；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为了使他的论点更有说服力，他还引经据典，试图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找到理论根据。他说：“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而是在人类完成一个社会形态，一旦这个社会形态会满足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时，就会终结。换言之，他们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不是说不再发生重大事件或不发行报道这类事件的报纸。不如说，真正的重大问题都已解决，形成历史基础的原理与制度，遂不再进步与发展。”^①很显然，福山赞同的是“保守的”黑格尔而不是“革命的”黑格尔；他不仅否定了共产主义，而且还歪曲了马克思。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历史不仅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而且也不会终结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建立恰恰是真正“人”的历史的开始，“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②当然，按照辩证法的思维，社会发展有上升期，也有下降期，恩格斯曾经满怀豪情地宣布，人类距离社会历史开始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遥远。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心目中，人类社会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和余地。但今天的形势是，资本主义势力步步紧逼，社会主义阵地接连失守，这给科学社会主义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

① [美]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本书翻译组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空想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4页。

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也给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心灵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

正是在这个历史环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了，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意境。这个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并非“苏联模式”一座“独木桥”，还有更加宽广的道路等待和需要共产党人去探索和开拓。当然，从世界历史进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刚刚兴起，因此它的历史只能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史”。

“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寥寥数语，深刻揭示出“史学”的风貌和价值。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历史不过是人们有目的的活动而已，“故事”是也。历史学则是记载这些活动的学问。写史，要求以客观的笔调记载过去发生的事情，但又不能不为史实注入历史学家的主观情感。“述而不作”本身就是“作”。至于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不外有三：首先是史实的层次，它是所有历史知识活动得以展开的起点。其次是因果层面，历史学家在这里的努力是尽最大的可能从那些扑朔迷离、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寻历史的规律，找出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再次是价值的层次，历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高级形式，无可非议地应和整个文化的进步保持内在的统一和逻辑的同质性。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恐怕很难像一个气象学家预报天气那样，描述人类所经过的种种苦难，诸如奴隶制、殖民屠杀、灭绝种族等罪行而无动于衷。因此，历史学家又承担着价值守护神的使命和责任。^①按照这个思路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历程，则面临一系列问题。

问题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是否具有科学性。“科学”就是描述事实，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指出：“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冥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成立也愈易，愈反则愈难。”说到史学，

^① 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流至今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又斯学所函范围太广，各人观察点不同，虽有极佳良现存之史料，苟求之不以其道，或竟熟视无睹也。合以上诸种原因，故史学较诸他种学科，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他又说：“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①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更是感叹史料的缺乏：“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实际上，中国历史典籍汗牛充栋，史料浩如烟海，但问题在于如何判断其真伪。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知识得以展开的事实依据。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崭新成果，描述这个过程和一些基本事实似乎比较容易。但实际上，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史料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充分发掘和展示，它所依据的重要文本——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还没有全部问世。如果全部问世了，有些说法可能要重新表述，有些事件也许要重新排列。即使史料充分，又遇到了一个取舍的问题。“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他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照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历史学家决定的。”^②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然很乐意提及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中国“两弹一星”的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9—40页。

^②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页。

辉煌成就，但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苏联的“大清洗”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又涉及到学者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史德”问题。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比较短暂，有些事实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现在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是事后人们的认识，但在当时没有引起社会上的任何注意，甚至它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到会，一直到今天，一大闭幕的时间还没有定论；今天许多看似重大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被后人忘却或遭“戏说”。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着“中国的现代性”的话，那么“它的一部分特征已经相当清晰，一部分特征才初见端倪，还有一部分特征尚未显现。”^①“实其事”不容易，“求其是”则更难。因此，在这个层面上，今天学者们所叙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的科学性必然要受到质疑和挑战。

问题之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已由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证，但那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他们所描绘的共产主义图景在欧洲并没有成为现实，至今还只是一个需要通过后人实践证明的“假说”。中国社会虽然没有脱离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轨道，但本身不属于西方国家，拥有自己的独立发展线索和历史传统，近代以来也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道路，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数量微乎其微，资产阶级先天发育不足。对于这样的国家为什么能先于发达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是中国唯一正确选择问题的回答，则更要费一番口舌，而且需要创造一些新的概念。恩格斯早就说过：“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至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

^① [英]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